

疫情一周年,中國留學生的美國夢還在嗎?

新聞來源: 紐約時報

一個極其難熬的鼠年終於過去了,而接下來的牛年會更好嗎?也沒有人可以給出答案。我所採訪的七位留美的中國學生當中,有些受到重大影響,有些則沒有那麼嚴重,但是他們都已不是一年前的同一個人了——都表示,對中國與美國的看法以及自己的計劃變了許多。他們有着對未來的強烈的擔憂,但是他們也在用自己的方法去探索,如何在美國這樣一個動蕩的社會中生存,並且自我實現。以下是他們的故事。

回國的艱難逼得我要從政

1月8日,大學畢業的 Tina Li 拖着大大小小一共五件行李來到西雅圖塔科馬國際機場。為了遵守中國大使館近幾個月一系列檢測方面的規定,住在波特蘭的她提早三天到了西雅圖,一共去了四家檢測機構,終於得到了“雙陰性”的檢測報告。

但是,隨著登機的時間愈來愈臨近,她卻遲遲沒有收到綠色的健康碼。她說,她幾次三番給中國駐美國的領事館發郵件,都沒有得到回應。她只能先趕去機場,在值機櫃檯前才發現,有數十乘客都沒有拿到綠色的健康碼,儘管他們的核酸檢測結果都符合取得綠碼的標準。“大概有五十多個人沒登上飛機,有的人連死亡證明都拿出來了還是不給飛,”她在朋友圈寫。

2020年2月,北京首都國際機場外,往常擁堵的通道如今幾乎空無一人。

“祖國母親是你最堅強的後盾之類的話,都是一句笑話,”她有些無奈地說。她現在滯留在西雅圖,正忙着預定舊金山或者洛杉磯起飛回國的機票,也在絞盡腦汁想該如何證明自己回國的必要性。

“我畢業了,在美國找不到工作,想家人了,想回家和他們團聚,你說我要怎么把這些寫得緊急一些呢?”她問。

Tina 說,18歲那年出國的時候,她和父母關係並不融洽,寒暑假也總是報名參加社會考察和實習,就為了有藉口不回國。但是經過疫情一年,什么都要靠自己,也沒有家人的孤獨,她和父母的關係逐漸和解了。這次連工作簽證都顧不上申請,只想儘快回到父母身邊。

但同時,她感到很矛盾。她說,自己來美國的時候,是一個非常愛國的“小粉紅”,在大學校園里,她還因為 2019 年香港的遊行事件和來自香港與台灣的同学激烈辯論過。而這次她和周圍的中國同學難以回國的經歷,讓她開始反思中國的一些政策和社會現狀。她的朋友盡盡艱辛從美國回到了國內的時候,遭到鄰居在小區的微信群里不斷指責她“千里投毒”的做法,甚至在居家隔離期結束之後,仍然在公眾場合辱罵她和家人,讓他們滾回家歇着。

Tina 認真反思道:“我覺得這個社會出了一點問題,人們實在太憤怒了,而且動不動就把我們這樣的留學生和‘境外勢力’挂上鉤,但其實我們也是中國國民,也應該享有基本的權利和自由。”

這現狀更加堅定了她想要從政,然後從政策上改變社會的想法。原本,她的父母對她的要求是回國之後要找高薪的工作,最好是做金融,要買車買房。但是現在,她的父母對她的要求更寬鬆,只要她健康和快樂就可以了。聽到她說想要從政,可能會從最底層的公務員或者村官干起,她的父母也表示會全力支持她。?

“現在的政客都太腐敗了,他們和底層的百姓脫節太久了,不知道人們真正需要的是什麼。”Tina 說。“我們需要的是大使館可以把回國的規定說清楚,不想讓我們回國就不回國,而不是天天改變政策,或者用一些很模糊的話來搪塞我們發過去詢問的郵件。”

“美國的政客也是,採取一些根本沒有用的社交隔離措施,苦的是老百姓和小商販們,受益的是大企業,”她說。“我希望可以做一個真正能夠傾聽老百姓疾苦的政客,然後推行一些方便最底層最邊緣的群體的政策。”

見識了美國的另一面

如果沒有疫情,Eric Ma 會于 2020 年暑假在美國進行實習,然後為畢業之後找工作做準備。他在哥倫比亞大學進修遺產保護學碩士,生長在北京的他從小對古建築與城市歷史充滿了興趣。2020 年 3 月時,他已經面試了好幾家博物館、政府機構等,一切進行順利。

但是當疫情來臨,所有的面試都沒有下文。他畢業的學長學姐們也找不到工作。政府停擺,建築項目停工,博物館關門,對建築專業的他們的打擊是巨大的。

有一段時間,他很焦慮,精神壓力很大。他也羨慕在國內讀研的大學同學們,許多人去了故宮等地實習,他也想過要不要回國,花了很長時間研究怎么買飛機票。但 Eric 最終決定留在美國。我問他,還到 2019 年再選擇一次,還會來美國讀研嗎?他說還會,因為在持續近一年的疫情中,見識到了世界完全不一樣的一面。

疫情期間,哥倫比亞大學碩士生 Eric Ma 留在了美國。他說自己有段時間很焦慮,精神壓力很大。

“新冠肺炎大流行帶給我個人的不僅僅是煩惱和不便,它有時也意味着新的觀察世界的角度,”Eric 說。“在這場波及每一個人的歷史性事件里,我看到了混亂,矛盾,人性的險惡,也見證

了氣壯山河的偉大勝利,還有來自社會基層的人性光芒。”

他說,他見證了紐約市把教堂改造成醫院,見證了志願者在口罩最緊缺的時候在街上發免費的口罩,見證了救護車在馬路上川流不息。他觀察到了許多令人感動的細節,比如每天晚上七點鐘,大家自發去窗口鼓掌表達對醫護人員與其他必要工種的人員的敬意。

但是他 also 對美國體制感到非常失望。“在來美國之前,從未懷疑過美國是一個強大的國家,是當今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覺得美國解決問題的能力是這個世界上最強之一,”他說。“實地經歷過之後,覺得美國的表現配不上它的國際地位。覺得政府部門和應該為之負責的高層領導人是完全失職的,覺得他們辜負了底層人民的表現。”

如今,美國的疫情還在持續,他已經找到瞭如何在疫情中努力過好生活與保持求知慾的方法,比如多去觀察一些平時被忽略的角落,用相機去記錄下平凡人的生活。

但 Eric 坦言,看兩個國家的政府彼此攻擊



甚至謾罵,卻是不會好受。“我作為中國學生,想要多瞭解美國,想要從這里學到一些東西,我身邊的很多美國人也想多瞭解中國,”他說。“但是在敵對的大背景下,我和很多美國人的這些微小的願望就越來越無法得到滿足。”在美國“黑”下來了,特朗普的支持者卻給我送溫暖

一場疫情徹底讓 May Fang 徹底醒悟過來——“原本以為自己是天之驕子,後來才知道自己是天之棄子,”她自嘲說。

就在一年前,她還是得州大學奧斯汀分校的高材生,而且早就找到了上海一家諮詢公司的工作,只等着 6 月份拿到畢業證書,然後回國入職。也正因為如此,她並沒有申請可以讓她畢業之後繼續留在美國工作的 OPT 簽證。

武漢暴發疫情的時候,她連續三天開車出門,買光了周圍超市的口罩和消毒水,通過武漢大學校友會捐給武漢的醫護人員。她天天晚上刷微博上和疫情有關的信息,李文亮去世那天,她哭了很久很久,第二天都沒辦法去上課。

“當時覺得自己在美國很幸福,也竭盡全力地幫助國內的人,”她說。“沒想到後來,美國的情況更糟糕十倍一百倍,而我在國內的朋友生活逐漸恢復正常,我的生活卻完全被毀了。”

她在疫情前,很早就買了 6 月份回國的機票,但是在值機的時候,得知因為其他幾班航班被取消,所以這班航班超賣了,她和許多乘客無法值機,拿不到登機牌。而當時,她的學生身份已經到期,必須在 90 天的寬限期里離境,車已經賣了,房子也退了,大件的行李和冬天的衣服也都打包寄給了家人。她的生活一下子就亂了套。

雪上加霜的是,她因為連續好幾天奔波各地找房子,最後 8 月感染了新冠肺炎。她的症狀並不嚴重,但看到了檢測報告上的陽性字樣,她的眼淚止不住地流下來,渾身發冷,抖得像篩子一樣。

病好之後,10 月初,她的母親不再放心她駐在美國,取出積蓄給她買了 11 月中旬九千多美金的商務艙機票,等待她的卻是最新的雙陰政策——核酸陰性和血清抗體陰性。她身體里還有新冠抗體,測了許多家都測不出來抗體陰性,這樣一來,她回國的路算是徹底堵死了。

她也試過在網上抱怨自己的處境,說自己曾經給武漢捐物資,憑什麼不讓自己回到祖國。回復里都是罵她自私和不顧大局的,直到現在,還有人私信她,問她怎么還沒死。

現在,沒有簽證,沒有駕照,沒有合法身份的她在美國“黑”了下來。她沒有辦法工作,只能靠父母每月給她一些零花錢,也沒有社會保險號和財產證明,沒辦法長期租房,只有在網上找各種短租房或者群租房。她以後要申請美國簽證都可能會有影響,但是她說,自己顧不上考慮這麼多,因為原本也沒有準備留在美國工作或者讀博,她只想儘快和父母團聚。

“我一個人在美國,真的是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

聖誕節期間,她終於放下面子去領取餐館發放的免費食物,冷風中,她站在長長的隊列里,周圍都是因為新冠而失去工作甚至無家可歸的人,她想,自己到底是哪一步走錯了,才陷入如此的境地呢?

去年聖誕節,困境中的 May Fang 終於放下面子,領取了餐館發放的免費食物。

好在周圍的鄰居在聽說了她的情況之後,紛紛給她送來食物和禦寒的衣服。她暫住的地方是一個支持特朗普的社區,住戶很多都是商店收銀員、巴士司機等,收入不高,但是社區里每周都會有人把舊衣服、舊傢具和多餘的食物拿去社區的教堂,供有需要的人免費取用。

從 1 月下旬開始,她通過在教堂里做一些義工來換取免費的食物,也可以免費使用教堂里的廚房,這讓她的生活稍微穩定了一下。她有機會和美國不同階層的人打交道,互相幫助,這樣的經歷讓她想要在將來做一個社工。

May 說:“我原本很害怕那些特朗普的支持



者會歧視我,會叫我滾回中國,但是他們都很熱情。而且因為大家的生活都受到了疫情的影響,所以很是有種抱团取暖的感覺。知道我不會之後,他們爭着開車載我去超市採購物品。我原本不知道在這個城市里有這麼多志願者機構,有幫助流浪漢的,有幫助少數族裔的,有幫助單身媽媽的。我覺得,回到中國之後,可以在中國的城市里建立起類似的互助機構。”

但她現在也不排斥再有機會的時候留在美國工作。因為自身的遭遇,她對中國政府和美國政府都失望至極,後來又因為素昧平生的人帶來的溫暖,覺得社會也不是那麼糟糕的。她說,“我過去一年學會了不要給複雜的事情下結論。”

疫情對我是難得的機會

過去一年的艱難似乎並沒有那麼影響到安鉅的生活——因為她拒絕讓疫情改變她的計劃。

安鉅在沃頓商學院就讀 MBA,2020 年 1 月,正在上海探親的她在中國疫情徹底暴發前順利地改簽機票回到了美國。之後,美國疫情迅速惡化,學校轉成了網課,她又于 5 月份乘坐私人包機回到了中國。但是在家裏呆了快半年之後,她 10 月份又回到美國費城了。(回美國前,她接受了中國國產的疫苗注射,當時需要有關係才能輪到。)

疫情期間空蕩的哈佛校園。一些大學計劃重啓線下教學,但僅對少部分學生有限開放。

“我回來美國,是因為早就規劃好的創業項目要開始啓動,”她說,“當然,如果我留在中國的話,日子會舒服很多,可以正常出門吃飯,看電影,但是我不希望因為疫情而改變我的人生規劃。”

應該說,她是因為家里條件好才比較容易這樣去安排。安鉅的父親是商人,家境殷實,母親則來自官員家庭,她很早就去了美國,在家人的支持下開公司,做投資,生活風生水起。談到疫情對她的影響時,她笑着說交了非常貴的學費,希望可以拓展一些人脈,卻變成了全網教授課,同學之間連面都見不到,更別說進行社交了,也少了許多嘉賓講座等課餘活動。但她說自己在課業輕鬆下來之後,還開始自學編程和投資股票。

安鉅現在甚至有點後悔在美國疫情暴發的時候回到國內去躲疫情了。她說,自己認識的幾位在美國的創業者或者投資人,都因為疫情期間房價和股價的漲跌,身家翻了幾倍。“我現在意識到了,全球疫情這麼巨大的事件,對大多數人來說都是災難,但是對最聰明最頂尖的那群人來說,是很難得的機會。”

從小在商場里耳濡目染的她也改變了自己的職業規劃。她原本希望自己線上教育的初創企業可以在三年里盈利,但是她現在的計劃是 18 個月內實現盈利;她原本希望可以做大公司的女高管,但是她現在希望做一個連續創業者——不斷在危機中發現機會。

把健康與快樂放到學業與事業之前

金珊妮和楊錦憶是一對來自武漢的閨蜜,在康奈爾大學學習建築。她們永遠都不會忘記黑色的 1 月和 2 月。

“我和我也是武漢人的室友天天抱頭痛哭,”錦憶說,那段時間,抱怨那些上層領導人的不作爲所帶來的憤怒就成了情緒的出口。憤怒的背後是身處千里之外,什麼也做不了的無力。她曾經參與了一個網絡上的籌款組織,很快就群策群力募集到了上百萬人民幣,他們花了其中的幾十萬購買當時武漢急需的口罩,但是卻被對方給騙了,凝聚着大家的關懷的捐款就這麼石沉大海。

珊妮的父母都是湖北省中醫院的醫生,是最早和病毒搏鬥的那一群人,亦在最早被感染的那一群醫護人員中。1 月底 2 月初,父母相繼感染,而他們在病好後,又立刻投入到了繁忙的工作中。珊妮在講述那段往事仍然會傷心落淚,她記得父母都確診之後,聲音有些虛弱和沙啞的父親打電話給她,用前所未有的嚴肅口吻告訴她要好好學習,好好生活。但是父母確診的消息,也讓她心態從之前的恐慌和擔憂變得堅定。

似乎是一開始就經歷了疫情最糟糕最無助最恐慌的階段,所以珊妮與錦憶在後來的一年里,遇到其他的困難和障礙,都有了些游刃有餘的成熟。

經歷了疫情之後,在康奈爾大學學習學習景觀設計的金珊妮說,想要向療愈景觀的方向發展和研究。

她們說,現在自己已經能夠比較從容地面對那些“武漢病毒”和“中國病毒”的歧視,不再把別人的侮辱當成一回事。她們也逐漸從夜夜流淚、不能入眠的情緒中慢慢走了出來,甚至開始有意識地去關心默在宿舍里的那些落單的同學們;她們會約學弟學妹一起做菜,也會給老師過生日。面對中美關係的惡化,中國媒體上對於美國抗疫之糟糕的渲染,和美國媒體上對於中國的敵意,她們也都能夠保持一顆平常心。

她們也開始把健康、快樂這些概念放到學業有成、事業有成之前。如今,她們選擇在康奈爾繼續自己的學業,學校給同學和教職員工每周進行一次核酸檢測,只允許核酸陰性的人進入教學樓,還有好幾個心理疏導平台供她們傾訴,所以她們在生理和心理上都覺得很安全。

但是經歷了疫情之後,珊妮說,她更想要畢業後回國,在一個和父母家人見面更方便的城市。而在職業規劃上,學習景觀設計的她開始想要向療愈景觀(therapeutic landscape design)的方向發展和研究。療愈景觀目前在醫院、療養院等應用得更多。珊妮說,父母在家隔離了很長一段時間,是樓上院子里鬱鬱蔥蔥的綠色植物讓他們有了堅持下去的動力。她自己也經歷了學校的突然關閉,能夠保持樂觀,和堅持戴口罩去戶外跑步中與大自然的接觸分不開。所以,她認為後疫情時代,公共區域的設計會更加考慮怎么給人更多的空間,怎么讓人們放鬆身心。

還是相信民主比權威制度好

梁曉晨是加州大學聖塔克魯斯分校的社會學博士。她說,過去的一年里,疫情、BLM(“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大選等許多問題漸次出現,也讓她覺得自己難以融入中國留學生的圈子,她開玩笑說:“我和我的男朋友應該是留學生里面最討厭特朗普的。”

她所面臨的最主要挑戰可能是針對她的社會與政治價值觀。據她介紹,身邊很多中國留學生都是社會達爾文主義者。他們反對 BLM 遊行,反對政府派福利給非法移民,他們拒絕任何幫助少數族群和弱勢群體的行爲,覺得那是人家咎由自取。他們中的許多都是學計算機專業的,也有人已經有了硅谷的實習或者工作經歷。他們覺得中國疫情的表現很不錯,因此看不起別人。但是他們也不願意因為疫情的原因回國工作,因為自己都可以在家學習或者工作,收入也沒有減少。

他們在梁曉晨詢問起來說,自己很小的時候就被家里人灌輸了一種要做“人上人”的觀念——要去名牌學校讀書,要去名牌公司工作,要買豪車,住大房子。而在美國,因為房價車價相對中國的北上廣更低,名牌公司也比中國更多,所以他們在美國更能夠實現童年就有過的夢想——住別墅,開特斯拉,生幾個孩子等。

在武漢舉行的一個展覽,紀念這座城市與新冠病毒的鬥爭。

好在疫情本身並沒有給梁曉晨的生活帶來許多改變,想要做老師的她在疫情期間積累了遠程教學的經驗。對她未來的事業和家庭計劃影響更大的,恐怕是特朗普政府 10 月宣佈對 H-1B 簽證政策的重大改變,新規將大幅度提陞薪水的門檻,嚴格限制申請人專業背景要求等。她以後想要做教師,而這個職業可能拿不到可以申請 H-1B 的基礎工資,這個可能會很大程度影響她未來的計劃。如今,她在等待拜登政府能否出台新政策。

她說,雖然中國疫情時期的管理方法很高壓,但還是有成效。她對特朗普這個人和共和黨也有了進一步的厭惡,尤其是他們在疫情期間製造種族歧視的無恥舉動。但相比較而言,她仍然更喜歡美國的政治和社會。

“(我)還是相信民主是比權威更優越的政治制度,只是目前美國的民主制度不完善,”她說。“但是就個人而言,(我)在美國感受到了更多的包容和理解。”